



日本的中国移民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

第二辑

日本的中国移民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

日本的中国移民

RIBEN DE ZHONGGUO YIMIN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61,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1002·685 定价 (精)7.00元 (平)2.50元

目 录

前 言	(1)
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	汪向荣(5)
关于中日关系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苏崇民(19)
徐福、日本的中国移民	汪向荣(29)
“海州湾偏西说”质疑及其他	汪承恭(67)
卑弥呼女王的大使难升米赴魏都的时间析疑	张声振(79)
空海和日本真言宗	杨曾文(96)
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文献	王守稼 顾承甫(112)
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	冯佐哲(131)
清初台湾复归祖国及其和日本的关系	沙 里(147)
何如璋与光绪初年的中日关系	郑海麟(163)
康有为、章太炎的流亡日本	汤志钧(180)
戊戌政变时期日本营救中国维新派的活动	谢俊美(194)
王韬与中日文化交流	折 平(204)
内藤湖南的中日关系论	谭汝谦(227)
近代中国革命与日本民间舆论	王晓秋(252)
留日学生与中日科技文化交流	李杰泉(262)

反对侵略战争的日本老教育家榎本龟次郎先生·····	杨正光(289)
中国政局与币原外交·····	郎维成(304)
鲁迅和橘樸的谈话·····	朱越利(322)
某些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	杨启樵(334)
中日战争中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	吕乃澄(342)

前 言

一提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人们总是说一衣带水的邻邦，有悠久的友好历史，因此只有世代友好才能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话是不错，但这些地理条件和历史事实，过去不也存在吗？为什么在这一个世纪中，竟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在两国相仇，甚至兵戎相见的状态下度过的呢？特别是最近的一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中日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难道过去的人们都不懂得这些吗？不知道只有两国友好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吗？因此说，在今后的中日关系中，在两国人民共谋友好相处的前途中，陈词滥调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只有让两国人民真正知道和了解两国之间曾经存在和发生过的历史，友好和不友好的历史；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明确什么是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什么是危害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东亚和平的。只有在两国人民彻底和深入地了解了这些后，两国人民才能做到真正世世代代的友好。

导致过去中日两大民族长期失和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直接和表面上看，当然是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执行侵略扩张政策，致使中国人民为了保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不能不起而抗争。当时日本的领导阶层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针，单从中国的积弱来解释是不够的，主要还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中日之间长达二

千年的友好历史，没有从这些历史中取得经验，以致错误地估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力量所致。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两大民族为了探求相处关系，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些沉痛的经验使我们懂得，要真正做到中日两国长期友好，永远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只有在深入研究和了解中日两国之间关系史基础上，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发展友好，才能达到这目的。否则，世代友好等口号，仍然是表面的辞令，没有真正实际的保证。

这一年来，随着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往的频繁和深化，全世界都关注中日两国的动向，因此不仅在中日两国之间，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要求也一天比一天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在我们，作为当事国之一的从事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者来说，固然深感欣喜，同时也感到惶恐。我们高兴的是，不但两国之间的有识之士，连全世界关注东亚和平的人们都认识到了要确立东亚和平，建立中日两国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研究、了解和普及中日关系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不只停留于仅从目前的利害考虑，而要深入地探讨整个中日关系史，从历史上友好和不友好的关系中，正确总结经验和教训；然后使这些经验和教训在今后的岁月中发挥作用，不再重复过去的覆辙。

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人类的活动即历史的发展是有其一定规律的，要认识这种规律就必须正确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因此不尊重历史和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这种惨痛的教训，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是记忆犹新的。今天提出要世代友好下去，中日人民不再战等等的口号，都是从此惨痛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有了结论，并不等于就知道尊重历史，不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不再受历史的惩罚了。如果不把两国的友好关系置于稳固的基础上，不总结两千年来中日两国

间发生过的愉快和不愉快历史的经验,汲取其教训的话,还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从 1972 年中日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以来,总的来说,发展是健康的,友好的,但也不能无视某些不愉快的因素仍然残存着,仍然在顽强地蠢动。对待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导致中日两国蒙受巨大损失的侵略战争,很遗憾,日本方面仍有少数人不愿尊重历史,不知尊重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这种不愉快的因素,如不尽快加以消除,友好的基础如何能稳固,共同利益如何能谋求,相信有识之士是都会看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研究和宣传中日友好关系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是为适应这一迫切需要,为了推动中日关系史研究,为提高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水平,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作出贡献而成立的。研究会自 1984 年成立以来,为两国的长期友好作出了些微贡献。我们举办了一次学术年会,检阅了我们的力量;出版了年刊和会刊,每年还召开六次学术报告会。这都是想为中日长期友好的基础添砖加石,使人们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历史的经验中看到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使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不仅仅停留于口号而已。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第二次年刊,所收的论文除极少数外,都曾在年会上发表过,有的在发表前作了些修改。需要声明的是,这些论文都只代表作者本人的看法,和本会的论点不一定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但只要实事求是,不违反事实,就应当鼓励百家争鸣,使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内百花盛开,日趋繁荣。

在这次年刊中,可以看到,和第一辑年刊相比,中、青年作者的论文,特别是新一代所占的比例增加很多。这正是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时的初衷;在老一代学者指导下,尽快地使

新生的力量成长起来。希望明年的年刊中,中、青年作者论文的比例还会有所增加。

1985年12月

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

汪 向 荣

中日关系史是我国历史科学中的一部分，和其他中外关系史一样，既和中国有关，也关系着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外国，因此它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史，因为它还牵连着另一些国家的历史。

在叙述和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一般不存在着分期的问题，完全可以应用中国史的分期，因为在古代不必说，就是到近代中外关系比较频繁复杂的时代，中国和个别国家间的交往还是不多，屈指可数的。而和中国交往比较多的周围国家，又大多数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不论在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文教礼仪方面完全承袭了中国的样式，甚至还事中国为上国，奉中国的正朔。这些国家，虽然有其本国的历史，而且其社会发展也不尽同于中国，但正和中国国境之内各民族间的发展也不是平衡的一样，所以按中国史的分期来加研究和叙述，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但中日关系史的情况就不完全一样。

谁都知道，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十分密切、频繁。尽管有些时间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和有大海相隔的国家都很少往来；此外还有人为原因的阻碍，如中国在明、清时代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日本在江户时代的锁国，

禁止人民出国。但这些自然或人为的原因，都没有阻止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往来。即使在两国交兵，国交关系十分紧张、恶化的时候，人民和人民间的通好往来，也没有停止过。这和中国与周围其他国家交往不多、屈指可数的情况不同。

中国的文化曾经哺育了日本，使其缩减了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期间，也加快了其在生产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在风俗习惯，文物制度，仪礼服饰等等方面，都受中国很深的影响。奈良时代，甚至在上层统治阶层中，一切仿效中国，有以唐化为荣的情况，这和其他周围国家，并无多大不同。但日本毕竟和其他周围国家不同，它并没有脱离或放弃了本身的文化，虽然大量地摄取中国的先进文明，但也只是利用中国文化的力量加速其本身的发展和进步而已。在一定时期、一定事件上，他们也用过中国的年号，奉中国正朔，但日本有它自己的年号，国内使用的，始终是其本国的年号；就是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中国的年号，在他们的统治阶层中也议论纷纷，并不都是无条件同意支持的。加上在中国先进文明培育下成长的日本，无论在生产上、文化上虽类似中国，可并不等于中国情况的再现。也就是说，日本和其他在中国周围的国家不同，自始至终都以其本国文化为基础，吸收摄取外来文明，加以消化之后，形成了自己的东西。因此，在涉及中日关系史时，要想和其他吸收、摄取中国文明的周围国家一样对待，按照中国史的分期研究、叙述，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中日关系史中，尤其在近代以前漫长时期中，所有有关的人和事，和中国的关系都比和日本要深；有时还涉及到第三国，这种关系也主要是和中国的关系而引起的，因此不依照中国史的分期，而根据日本史的分期，那更不切实际，更无法说明事态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说，中日关系史，即使在中外关系史领域中，也是比较

特殊的。既和中国史、日本史有很深切的关连，又不同于中国史和日本史，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因此，在分期这问题上必须照顾和适应这些特点。

到现在为止，在研究和叙述中日关系史时，还没有其独自的分期法。不是依照中国史的分期，根据朝代来论列，就是按日本史上时代的划分而叙述。这样的分期，有其优点，但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没有根据、按照中日关系交往发展的过程、特点，因此就不免在纵的方面产生割断历史和在横的方面难以和中国历史、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相并论以探索彼此间因果关系，从而低减了许多事情在历史上的作用。

中日关系史著作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邻交志》和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译名《中日交通史》）等，都是按照中国史的分期，也就是根据中国王朝的递变而叙述的。虽然说木宫泰彦的著作中，把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和明清分别相联系成篇而研究叙述，但由于中国王朝的交替，使许多原来的一件史实，也不能不割断而随着中国史的断代来叙述。例如遣隋使和遣唐使，本来只是因中国王朝更迭而起的不同名称，实际上从600年开始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奏请废止为止，日本遣华的使节，即所谓的遣隋使、遣唐使都是为达到同一目的、执行同一任务而派出的，并没有随中国政局的变动而在性质上，甚而在方式上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最初的几次遣唐使，无论在人数上、航路上以及组成方面，都和遣隋使没有多大区别；以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先进文明需求的迫切，派遣到中国的使团不仅在组织上日臻复杂、完善，而且在人数上也较初期增加了二三倍。但这种变动，是在同一目的、任务下技术性的改变，和以后日本停止派出遣唐使之后，民间商船往来有质的不同。可是，如果按照中国

史的分期,即依王朝而分的话,势必把同样性质的使节分入隋、唐两朝;而把有质的不同的代表政府的使团和民间的通商往来同列。这样的论列方法,虽然也可以阐述清楚,但如果能在分期上就将两者区别,不是更符合实际,更使人能对这些往来关系从本质得到具体的认识,更清楚地了解中日关系史发展的过程吗!

秋山谦藏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方面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特别是在分期的方面。他不拘泥于一向以中国史上王朝的更替而划分的情况,或多或少根据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观察研究。他提出了研究中日关系史(他称为日支交涉史)至少应该从交聘、版图沿革、归化移住、赠酬、战争、漂流、学术宗教和贸易八个方面来综合研究。中日关系史就是类集这八个方面的事实的历史,不单单是两国间的国交往来而已。他这种主张是正确的,中日两国间的往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多方面的,只是有主有从而已。他也注意到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主要是以生产力为中心的发展影响两国交涉的事实,但他还偏重于政治方面。因此他对中日关系史的分期,基本上是依照日本史上所划分的时期来研究、论述的。这样就不免发生类似按中国史分期而产生的情况和缺点,例如把从现象上看类似而实际上却不同的事件,由于发生时期的相若而归入同一类型中的情况。例如十四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大约有二百年左右,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都受到倭寇的骚扰。从现象上看似乎是相似的,可是实际上,开始时劫掠朝鲜和中国北方沿海粮食和劳动力的倭寇,跟后来日本国内商业经济日趋发达,封建政权中少数人垄断对外贸易,以致和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相勾结而从事的武装走私,性质完全不同。虽然在形式上都是劫掠、骚扰,结果也同样是有害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人民,破坏和阻碍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可是从本质上看,这两种倭寇不是属于同一性

质,因此简单地将其分成前期和后期,很难剖析和说明这历史事件真相。甚而可以说,后来郑成功和南明的向日本乞师,也都和其有关。如果单从室町政权和江户政权这两个政权上的区分来分断、论述,就很不容易了解整个中日关系史中一些事件的因果。

因此说,中日关系史的分期,既不同于中国史,也有异于日本史。但中日关系史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和日本,不能不和中国史、日本史发生深厚而密切的关系,所以也不能不和中国史、日本史的分期相呼应。

那么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处理中日关系史的分期呢?

下面谈一下我对这问题的想法。这种分期,虽然也曾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但基本上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很不成熟,可商酌的地方很多。为集思广益起见,现在提出供大家参考,也希望知道大家对这问题的想法、主张,以便能作出初步的设想,供方兴未艾的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工作者有所凭藉和依据,不再借用中国史或日本史的分期,影响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我所说的历史分期,主要是指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明治四年)以前古代和中世纪时中日两国关系史的分期;1871年以后,也就是进入近代,两国正式成立外交关系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研究和论述上不同于过去,而且和两国历史间的关系也更形密切,这一时期中也更应划分更详、更多的阶段,才能说明当时两国关系史的实际。有关这一时期的阶段区分,以后有机会再加论列,这里暂不讨论。

中日关系史的分期,应该根据什么来作主要的凭藉?显然王朝的更迭,统治阶层的变化是不能、也无法视若依据的。我认为主要还是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日关系的开始、发展乃至中间的演变,无一不和当时两国间的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 需求有

关,因此用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变化作为主要依据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和日本,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文明开化前后的差别,所以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化上并不完全同;尤其在古代,两国间在这方面的差别很悬殊。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了铁手工业,并且开始能炼钢了,不仅有了铁制的兵器,而且也有了铁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农具),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可是同时期的日本列岛上,还处于氏族社会母系制社会时期,用极简单的石制工具从事渔猎为主的采集制经济;虽然已脱离了无土器时代而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绳文时代),但和中国的生产力、社会发展比还差很大的一段。

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流水一样,总是由高处流往低处,一直到平衡为止。这种流向的过程,就是两个国家、地区发生关系、交往的历史过程。当时日本列岛和中国之间在生产力、社会发展既如此不平衡,当然不会没有从中国流向日本的事;但是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加上当时日本列岛上还不可能有接受中国先进文明的能力,偶而有极少数流入日本列岛的中国先进事物,也无法为其所利用,吸收。因此在绳文时代,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发展极为迟缓,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停留在落后的采集经济阶段,这说明中国的先进文明对其影响不大,或者说竟没有。

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不但在政治上中国成了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在生产力、社会经济方面也因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因素被消除,因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迅速发展的生产力;通过移民陆续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使其停滞不前的落后生产方式也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在接近输入先进文明的地区,很快就从采集经济改变到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经济,结束

了长达几千年的绳文时代，进入了弥生时代。铁器也和青铜器同时传入到列岛上。当时在日本列岛上，虽已进入到父系制社会，但仍是部落国家林立。中国的先进文明最先是通过朝鲜半岛进入列岛，起了很大作用，后来进步了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又逐渐扩展到日本列岛的中部和东部，和中国之间有了直接的交往；慢慢的，在中国先进文明的哺育、推动和影响下，日本列岛上也开始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日关系史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这一阶段起的。

这段时间，即由秦汉起，一直到 589 年隋朝再统一中国为止的六七百年中，尽管到东汉末年以后，中国国内由于军阀乱战，形成了封建割据，南北朝并立等政治上的混乱；生产力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尤其是西晋被推翻以后一百几十年的大混战，使社会经济蒙受了一次历时长久的大破坏、大倒退，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它还是在前进的，尽管是螺旋式的前进，其速度也极缓慢。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也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并没有受到中国这种大混乱的影响；反而因为在中国先进文明传入、刺激的影响下，不但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进步，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列岛上开始有了统一的国家，迫切地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在当时情况下，就有向朝鲜半岛，并通过那里向中国取得文明的要求。因此从秦汉以后，直到隋朝建立之前的中日关系史，应该作为一个阶段来叙述。

在中国先进文明的哺育下，日本列岛上到六世纪时，已经完全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形态，进入奴隶制度的阶段。以皇室为中心的近畿奴隶主集团已完全征服和控制了日本列岛的绝大部分，尽管当时日本的奴隶主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即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拥有生产工具和奴隶，把奴隶固定在土地上，但随着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统治方式慢慢的难以适应了,奴隶主集团、奴隶主和奴隶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逃亡成了反抗的主要方式。接受先进文明较多的奴隶主也曾想利用在意识形态方面输入新的佛教思想,以代替旧的氏神思想来加强其统治,事实说明这种不彻底的改革无济于事。加上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已使日本有条件直接从中国取得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财富,特别是统治的经验。当时的中国,隋朝已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混乱,统一了中国,成立了王朝。虽然说隋的统一并没有使旧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以致没有多少时候又陷入烟云四起的战乱中。唐朝不久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中取得了政权,重又建立了一个比过去更强大、更巩固的统一国家。

一直到唐朝中叶以后,封建割据战争再度爆发,中央集权政治无力控制地方的割据势力,促使这强盛的大唐帝国没落。在这以前,唐朝是比汉朝还强大的国家。不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生产、经济上,都是当时最强大的世界帝国。灿烂文化和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曾给予其他国家,特别是周围地区的民族、国家以极大的影响。对日本,一个正处于要求确立和巩固适合其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而又和中国地处邻接的国家,当然更有吸引力。尤其是隋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一些政治上的做法和统治手段更使日本奴隶主集团中某些人向往;他们不顾风波之险,下决心直接向中国学习。这样开始了中日关系史上最灿烂的一页,由日本向中国派出了数以百计人员组成的使团,到中国去访问、学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使节到中国访问、学习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化革新和以后在日本史上占有辉煌一页的天平文化;当然律令政治和佛教国家化的出现等,也莫不与此有关。这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史,同以后日本史的发展关系很大,对中国史也是